

三 大 洲

— 亞洲、美洲和非洲旅行記

蒙哥馬利著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三 大 洲

——关于亚洲、非洲和中美洲的局势和問題
以及这些地区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防务政策和对英联邦关系的研究

蒙哥馬利著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編譯室譯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3年·北京

Field-Marshal the Viscount
MONTGOMERY
of Alamein, K. G.
THREE CONTINENTS

A Study of the Situation and Problems in
Asia, Africa, and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ose areas to defence
policies in the 1960s and to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Collins, London, 1962

根据倫敦柯林斯出版公司 1962 年英文版譯出

• 內 部 讀 物 •

三 大 洲

— 亞洲、美洲和非洲旅行記

〔英〕蒙哥馬利著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編譯室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胡同 1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0.95 元

1963 年 5 月第一版 1963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張 6 1/2 字數 150,000

統一書號 3003 · 674

目 录

序言 1

亚 洲

第一 章 中国实况.....	6
第二 章 中国实况考察——1961年.....	26
第三 章 中国往何处去?	47
第四 章 同毛澤东的临別一晤.....	62
第五 章 印度实况.....	70

美 洲

第六 章 北美——加拿大和美国.....	81
第七 章 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	100

非 洲

第八 章 非洲实况.....	122
第九 章 南非問題.....	129
第十 章 南非問題分析——1962年.....	146

防 务

第十一章 西方世界的防务政策.....	163
第十二章 英国的防务体制和英联邦.....	192

序　　言

我不遺余力地服务于英国陆军现役，历时五十年，于1958年9月结束；我是在1908年9月参加陆军的。在1945到1958年的战后年代里，我有幸结识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地区各国的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这个地区包括西欧和意大利、希腊、土耳其，以及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

每当我有较多时间来进行思考，我就觉得，我们有些政治领袖似乎未必正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政治中的一些主要事实——这些事实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是有很大不同的。即使他们觉察到所发生的变化，他们也是见“木”而不见“林”；在某些方面，他们的看法则显得过时了。例如，苏联的经济正在迅速发展，而且大约百分之五十的进展是属于国民资源方面的——教育、住宅、科学、研究等等。事实上，俄国正在迅速前进——而中国在一定时期内也将跟上去。我们的领袖们往往过分专心注意欧洲的事态，而不觉察非洲和亚洲、特别是中国的事态对西方政策的影响。西方的每一个政治领袖都被一群谋士所包围，他们各持己见，使他感到迷惑，而且在阴霾弥漫的世界政治海洋中不能凭良知辨识方向。但是在政治和军事生活中，参谋人员的意见是不可能一致的；领袖必须作出决定；不然就是犹豫不决，因怕犯错误而不去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这就是我们西方所犯的毛病。

我记得约翰·布莱特曾经说过，人们并不是仅仅因为他们担任着或曾经担任过显要的职位而就是伟大的政治家。一个身

居要职的人必须要有勇气——坚定的勇气而不是狂热的勇气。对公众尽职的道路总是崎岖不平、满布暗礁的，正确的途径并不总是明确的。我说的勇气是指那些英明、有远见和通情达理的人们的勇气，他们迫切希望能使国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种勇气是道义上的勇气，当然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它必须和其他一些品质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种性格，那就是：诚实、坚定的信念、紧紧地掌握原则、果断与刚毅。我认为性格比智慧更宝贵。

华尔特·李普曼的性格和直言不讳的勇气是我所深深敬佩的，他曾经写道：

“政客们只有通过对本选区的那些喜欢质问和具有威胁性的分子进行妥协、贿赂、引诱、欺骗或使用其他操纵他们的方法，才能在政治上取得进展。决定性的考虑不在于一项主张是否正确，而在于它能否赢得人心，不在于它能否行之有效，并证明它是正确的，而在于它是否会带给他选票并使他当选。”

我已找不到这段话的原文，但是它的大意就是上述的这些。主要意思是：政治领袖有时会为了职位和权力而牺牲原则，并且往往屈服。当然，勇气可能常常要求接受妥协，尤其在政治舞台上。

我自己了解到，阅读伟大人物的传记会得到帮助和鼓舞。但是这并不能给人勇气，人们必须从自己的灵魂深处去寻求勇气。

我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需要新的领袖。老一辈的领袖应该让位给年轻的一辈。我们需要这样的领袖，他们能够从日常动荡的事态中清楚地看出具有重要作用的事物；他们能了解问题的所在和条件；他们知道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肯定不可能

的；他們具有決斷力，能作出積極而建設性的事情，並且能說出他們奮力以求的目標。

總之，今天的政黨領袖必須有眼光，甚至是先見之明。溫斯頓·丘吉爾爵士具有這種品質，而且他把這種品質和高度的表達能力結合起來，他可以用簡單明瞭的詞句同各階層的人談話，而不用政治術語和口號把他的意思包裝起來。戴高樂將軍也具有這種品質，在這方面，他僅次於丘吉爾，尤其在眼光和勇氣方面。

肯尼迪總統可以成為我們西方所需要的領袖，他年輕而有魄力，勇敢而不害怕作出決定。

我們可以概括起來說，我們西方需要的領袖是一種匠人，他們知道要做什么，並且會去做，而不致使自由世界陷入什麼也不能做，只能坐待事物發展的困境。在西方，“因循守舊”的想法太多了。這種情況需要改變，必須狠狠地整頓一番，以免停滯不前。在這本書中我已試圖這樣做。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在 1959 年決定訪問東方集團即共產主義集團國家的領袖們，設法認識他們，並看看他們是怎樣的人以及他們對世界問題的看法。我對非洲發生的事情也有濃厚的興趣，在非洲，白人正在被迫撤退，似乎在白人撤退後非洲有成為真空的危險，這種真空隻會造成混亂和騷動。北美和南美是我所熟悉的，而我認為中美值得探索一下，以便了解古巴事件是否會引起這一地區以及整個加勒比海地區的國家的動亂。

我決定先訪問俄國，並在 1959 年 5 月到了莫斯科，在那裡，我花了兩天功夫同赫魯曉夫先生、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以及以索科洛夫斯基元帥為首的俄國三軍參謀長們進行了私人談話，索科洛夫斯基元帥在 1945 和 1946 年在柏林時和我很熟。俄國是東方集團的領袖，我希望從它那裡看出一些東方集團動

向的迹象，这一点我肯定做到了。从我在莫斯科进行的会談中，我清楚地看到，只要德国保持分裂状态，俄国对西方是无所恐惧的，俄国在可以預見的将来也不会同意德国的統一。但是从长远来看，俄国是害怕中国这个位处它的后門的人民共和国的。俄国对非洲抱有兴趣，它把非洲当作有可能让它在那里給西方国家制造問題以便混水摸魚的一个地区。因此，显然必須訪問亚洲和非洲。在亚洲，就人口而言，有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国有近七亿人口，印度約近四亿五千万人口，这两个国家都必須訪問。因此我制定了計劃，訪問行程如下：

俄 国	1959 年 5 月
印 度	1960 年 1 月
中 国	1960 年 5 月
非 洲	1961 年 9 月
中美洲	1959 年 11 月
	1962 年 1 月
	1961 年 12 月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叙述我訪問这三大洲的經過，描写我每次訪問时同各国領袖的会談情况，說明我訪問过的每一國家的問題，并估計这三大洲的事态对西方政策所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将从亚洲开始，因为从我的旅行中我清楚地看出，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中国。中国兴起成为一个大国是不可避免的。这件事可能造福人类，并可能締造各国普通人民所渴望的和平世界。但是，如果这是将要发生的事情，西方世界必須在現在就同新中国和好，并且平等相待。如果不做到这一点，我們就很可能在将来同一个拥有十亿人口和核武器的敌对的中国打交道——这不是一个很愉快的前景。

最后，在末了一章中我強調了加强英联邦的重要性，而不让它因参加共同市場而同欧洲的政治体系糾纏在一起。

陸軍元帥 蒙哥馬利

1962年9月

于汉普郡，奥尔顿，伊辛顿密尔

第一章 中国实况

正如我在序言里已經說明过的，在本书所討論的三大洲中我准备首先談談亚洲。我向來认为东西方的冲突是全球性的，不能限于北大西洋公約地区。只要西方拒絕同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国討論世界問題，这个冲突就无法获得滿意的解决。必須強調指出，对我來說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政府在北京，人口近七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政府在福摩薩，人口只有一千万的蒋介石的所謂“国民党中国”，后者在我看来，沒有任何資格可以冒充中国。

在我的軍事生涯中以及从此以后，我的习惯是首先听取別人所談的有关一个問題或一个国家的情况，然后去亲眼看一看，以便在现场研究各种詳尽的事实。在我年青的时候我就懂得了不了解情况的批評是沒有价值的：許多人沒有亲自了解事实就大事批評；許多批評者集中注意缺点，而忽視了优点。

1959 年在莫斯科时，我意識到，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很可能在于中国。因此显然有必要訪問这个国家，以便認識中国的領袖并了解他們的想法。如果我能看看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調查它的人口問題，同它的部长們討論革命以来的經濟和工业发展以及他們将来的計劃，特別是了解一下农业和粮食問題——这一切都会有助于我对中国将来的世界地位作出估价。

訪問中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人过去由于受外国侵略而遭受如此之大的苦难，因此他們赶走了“洋鬼子”，現在他們希

望能够不受干扰地用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我向毛泽东提出了友好的要求，我得到答复说，他们非常欢迎我去访问北京。现在我已经两次访问了中国。

第一次访问是在1960年5月；当时我的目的是和领袖们接触，取得他们的信任，那次我一直呆在北京；那只是一次为期一周的短短的访问。

第二次访问是在1961年9月；这一次我的目的是要到各地去旅行，调查所有有关的因素，以便了解1960年我所听到的是不是真实的。我乘飞机、汽车和火车旅行了一万英里以上的路程。

由于我有两次访问的经历，——应该说，这种经历就我所知是任何人所没有过的——我在1961年10月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写了以下的话：

“让我们不要轻视或者低估这个拥有将近七亿人口的偉大国家。中国人民在过去三年中经历了一个困难的时期，其原因在于連續的歉收而不在于錯誤的政策或不好的計劃；1959、1960和1961年华北和华中的干旱，华南的台風和洪水对于农业是具有灾难性的。然而，北京中央政府牢固地控制着这个局面。所謂大规模的饥荒，数以千計的人死于饥饿、物資极度匱乏、人們态度冷漠、全国惶惶不安的說法，完全是不真实的，这些都是那些希望毛泽东政权和他的政府失败的人所散布的谎言。这一切的談論都是荒謬的，也許甚至是危險的。

“在我剛剛結束的旅行中，我首先到了內蒙，然后向南到过华北、华中和华南；我訪問了十个大城市和許多城镇，也訪問了乡村。所有我見到的人們看来都很愉快和吃得很飽；我沒有看到任何一个营养不良的現象；有些地区粮食有时可能有些缺乏；但是粮食总还是足够的，现在这方面的情况正在改善。

“这个国家的人民具有巨大的潜在力量，他們聰明而苦干，可能是世界上最勤勞的民族。西方世界最好还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維持友好关系；这个国家需要以平等相待；它在一定时期内将成为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强国。一个偉大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正在前进。”

如果对于过去約一百年的事态发展沒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要充分理解今日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的原因，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因此我将給讀者提供必要的历史背景——从1839—1842年鴉片戰爭开始，然后概括地介紹1880年左右由孙中山发起而由毛澤东繼續的革命的主要事件，并叙述毛澤东和蒋介石争夺权力的主要事件。

中 国 革 命

从1839到1842年間，我們英国人在中国采取了軍事行动来强迫这个国家购买鴉片（在印度生长的），以便使我們自己能够获利。中国人被打敗了。我們在沿海地区和內地城市据有“租界”，經營海关和邮政，并要求給我們在中国的侨民以治外法权——美国和法国也这样做了。如果說我們在那个时候为我們自己的目的剝削中国，从这个国家榨取我們所能榨取的东西，我們自己发财致富，却很少或者沒有做任何事来提高中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他們中間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完全文盲，并且生活在最落后和原始的条件下，这样的說法是并不过份的。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深切仇恨可以說从那时开始了。在这以外，还要加上皇帝、軍閥和地主的腐敗的政权。

約在1880年，在中国被看作是一个偉大人物的孙中山得出这样的結論：这种情况不能再忍受下去，他針對这种情况开始組

織了革命；但是他沒有能找到問題的解答。他在 1925 年去世，到那时，他已得出結論，认为必需“喚起民众”；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胜利。他还确定必需同俄国合作，俄国在 1917 年革命后已平等地对待中国。

孙的革命慢慢地发展壮大，从 1900 到 1911 年他展开斗争并推翻了持续二百七十多年的清朝专制統治，从而結束了曾存在二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孙所組織的革命有很多弱点；它缺乏紀律和訓練；武装斗争的計劃和准备工作是在国外进行的，同国内群众的斗争不是密切联系的；它沒有农民和工人自己組成的革命軍队。然而它胜利地完成了一件事——它除掉了从 1644 到 1911 年掌握統治的滿清皇帝的暴政。我們現在可以更确切地看一看二十世紀的情况。

- 1911 年 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退位。他現在在北京当园丁，他說同当皇帝相比，他更願意作园丁！至少他在 1961 年是这样对我說的。經過軍閥之間爭夺权力的斗争，孙中山成为新的共和国的总统。他的政府以北京为中心。
- 1919—20 年 現在毛澤东在舞台上出現了，他开始在农民中間散布馬克思主义的种子。
- 1926 年 毛在广东建立了一个农民讲习所，訓練来自乡村和城镇的干部，他們回去后将宣傳革命。課程共三个月。他的計劃是以农民作为他的革命的基础，最后推翻所謂帝国主义、軍閥和地主的压迫，并从中国永远清除掉所有外国的干涉。1921 年他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 1923—24 年 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合作反对軍閥。
- 1925 年 孙去世。蒋介石继承他为国家的軍事首脑。

- 1925—27 年 蒋同共产党合作对军阀作战。
- 1927 年 蒋背叛革命而同军阀合作。他在南京成立了政府，不久就证实他的政府是腐败的，而且腐败透顶。毛决定一定要打败蒋，为此目的他组织了自己的红军，在 1927 年 8 月 1 日成立。
- 1934—35 年 在华南毛的红军遇到了困难，他决定转移到华北并建立一个安全的基地，从那里来进行反蒋的战争。他组织了“长征”，表现了惊人的坚忍力，1935 年在延安建立了总部。长征历时一年多。
- 1936 年 蒋的军队进入延安，毛被迫将他的总部北迁，并在延安和榆林之间的地区不断移动。
- 1937 年 毛回到延安。
现在同日本的战争正式开始，毛和蒋实行合作抵抗共同敌人。
- 1945 年 日本被盟国打败，在中国被毛和蒋的中国军队打败。
- 1946—47 年 现在蒋介石对毛泽东的共产党所控制的政权再次进行战争。美国人对蒋提供军事装备和意见，引起毛和他的政权的刻骨仇恨。
- 1949 年 最后蒋以及他的美式装备的部队被红军完全击溃；他们被赶出中国大陆，在美国海空军援助下在福摩萨（台湾）岛上避难。他们至今一直在那里，经常受美国海空军保护。
- 1949 年 10 月 1 日 毛泽东在北京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的政府得到英国政府外交上的承认。美国承认拥有一千万人口的台湾的蒋介石政府，拒绝同拥有六亿五千万人口，今天已将近七亿的人民共和国打交

道。于是就有了两个中国。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被蒋介石政府所占据，这当然是荒謬的。

以上所概括的事件可能有助于讀者更好了解中国革命的复杂情况以及毛澤东和蒋介石所起的作用。对我自己來說，这样写出来确实使我搞得很清楚了。

毛在达到了他的目标、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以后成为中国无可爭辯和公认的領袖；他的权力是絕對的，他的話就是法律；他把人民从处于过去政权的屈辱下“解放”出来，并且把“洋鬼子”赶出了他的国家。現在这个国家有一个他們所信任和願意追随的領袖。

讀者必須了解，在皇帝、軍閥和地主的政权下全部生活的重担都落在农民的肩上，他們生活在极端貧困和被人忽視的情况下。那时候大約只有两件事能使他們的生活有生气——饥饿和爱情。如果一个国家曾經具有产生共产主义的成熟条件，那就是当时的中国，只要有領導者，革命的条件也是成熟的。

反对专制和压迫的革命是在 1880 年由孙中山正式发动的，并在 1949 年 10 月由毛澤东胜利地結束，如我們以上所看到的。

中国的命运現在掌握在它自己手中。在考察这究竟是怎样实现的以前，我們先来看一看实现这一切的那些人，他們現在是人民共和国的領導人。

中国的領導人

今天中国最重要的人是以下四个人：

毛澤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刘少奇——国家元首

周恩来——总理

陈毅元帅——外交部长
他們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毛澤東

毛澤東是新中国的真正的領袖。他是一个最有吸引力的人物。他的父亲当过长工，是一个貧苦的农民，靠着精打細算，順利地經營谷子，最后发迹起来。毛由于家庭貧困，唯一可以使自己受教育的办法是設法进一个不仅免交學費而且还免交膳宿費的学校，而他做到了这一点。他自己受了教育后，成为一个学校教师。虽然他現在是中国的統治者，而且真正受到六亿以上中国人的崇敬，但是他沒有一点架子；如果能够觉察到一些的話，那也純粹是意識形态上的。他現年六十九岁。当我 1960 年第一次見到他时，我觉得他已显出了年紀。当人們考慮到他年青时的艰苦生活，1937 年开始的长期抗日战争的考驗以及以最后推翻蔣介石統治的国民党中央而告終的內战的时候，这种感觉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当我对他更熟悉以后，我的看法开始改变了。虽然他身体魁梧，走路緩慢，但看上去他很健康；他的目光炯炯，肤色光潤。他主要的运动是游泳，他曾經在长江上的多次著名的比賽中获胜；当你看見他脫了衣服，只穿着游泳褲时，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注意身体的健壯的。他一天只吃两頓飯，一頓在下午二点半，另一頓在晚上八到九点。他通宵工作，很少在早上五点前睡觉，他睡到早上十一点左右起来。他只喝开水，烟抽得很厉害，像所有的中国人那样，只抽香烟。我在中国沒有听人提起过肺癌！

毛有卓越的才智，处理問題非常实际。他讲话緩慢和审慎，用字經過仔細的选择，并用短句子。他偶尔对我讲一个英文字，可能是对我表示客气，不过发音不太好！虽然他讲话緩慢，但是他的思想并不緩慢；他会立即回答你的問題，并使人对他的看法

不会产生任何疑问。当我们的谈话中出现我很熟悉的西方世界政治领袖的名字时，我很快就发觉他对人的判断是很精明的。我问他其中某些人的看法。到目前，毛除了两次访问莫斯科外从未走出过中国，而且他也从未见过任何西方的政治领袖；但是他密切注意西方世界发生的事情，他在这方面的了解是惊人的。他对谈话中提到过的某些政治领袖的评论和判断是非常有启发和准确的，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

毛泽东有极大的幽默感，正如所有的中国人那样。当我们1960年5月第一次见面时，他对我说：

“我想你知道你是在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在联合国我国被扣上这样的称号。你是否在乎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呢？”

他说话时带着闪动的眼光。当我回答说西方世界的某些国家过去在这方面不是完全无可指责时，他大笑了起来。

有一次晚宴时，我们谈论了革命这个题目，这是当他出乎我意料地谈到克伦威尔时开始的。我说，如果没有克伦威尔，今天我们知道的英国就会很不同了。我又说，革命本身不一定是坏事，例如美国的革命迫使主张建立联合帝国的保王党向北迁移，建立了今天的加拿大。其次，法国革命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更好的法国。还有，他本人在其中起了卓越作用的中国革命，扫除了很多外来侵略、封建压迫和腐败。他以极大的兴趣并默然听着这一切。然后微笑地看着我说：“看来你是很开明的。”

这句话在那天晚上就成为不断谈笑的题材，因为我不断地问他为什么他对我显得“开明”感到意外。他最后承认他感到意外是错了。

总之，我认为同毛泽东会见和谈话是非常愉快的。当然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是我并没有觉察他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正计划把他的思想意识强加于其他国家或者计划使全世界共产主义